

「農改之父」杜潤生逝世

享年102歲 推動包產到戶釋放農村活力



杜潤生 1913—201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10月9日早晨6點20分，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102歲。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對於中國農村推動包產到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重大改革起到關鍵作用。

近幾年，杜潤生一直在北京醫院住院。知情人士稱，老人離世很突然，情況突然惡化，經過一夜搶救，最終在9日早上離開。

起草五個「一號文件」

9月初，杜潤生還為於9月19日召開的「中國現代鄉村旅遊30年」論壇題詞：「鄉村旅遊好！」當時國家工商總局原黨組書記、副局長楊培青宣讀題辭時說，這是杜老在清醒的時候寫出的很硬朗的筆跡。落款時間為2015年9月3日。這也是杜老去世前的最新動態。

杜潤生出生於1913年，原名杜德，中國經濟學家、資深農村問題專家，曾先後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一直認為「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問題」。

杜潤生的名字與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場戰役——農村包產到戶是緊密聯繫在一起，他所主持起草的「75號文件」和五個「一號文件」，為當時飽受爭議的包產到戶提供了法律保障，使中國農村迸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結束長達30年爭論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改革的起點是以包產到戶為標誌的農村改革。據媒體報道會議稱，改革前高層爭論異常激烈，當時杜潤生試探性地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這一建言得到了中央高層的應允，並最終形成後來著名的1980年75號文件，即《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文件指出，對貧困地區來說，包產到戶是一種必要措施。這個文件打破了多年來形成的包產到戶等於資本主義復辟的僵化觀念，向前邁進了一步。事後有人總結，正是農民的「闖一闖」，杜潤生的「試一試」和鄧小平的「看一看」，促成了這個偉大的變革。

一年後，時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潤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確立了「包產到戶」的合法性，結束了對「包產到戶」長達30年的爭論。

此後，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5年，杜潤生參與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對於家庭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的推廣和鞏固發揮了重要作用。

人物名片

杜潤生，山西省太谷縣人，1934年考入北平師範大學文史系。中國共產黨內最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之一，農村改革重大決策參與者和親歷者，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他直認為「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問題」。他多次向中央諫言，主張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5年參與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對於家庭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的推廣和鞏固發揮了重要作用。



■2008年，杜潤生獲得第四屆中國發展百人獎終身成就獎。

網上圖片

杜潤生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書長、中南局軍政委員會土改委員會副主任，領導中南地區土地改革。1953年初調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秘書長、國務院農村辦公室副主任，參與組織農業合作化。1956年後，歷任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中國科學院秘書長、中共中央科黨組副書記，1961年主持起草《關於自然科學研究的14條意見》。1979年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1983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主持起草農村政策文件，特別是五個「一號文件」，提倡小城鎮發展戰略。



■杜潤生著作。網上圖片

杜潤生並曾出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中國農學會名譽會長、中國農業經濟學會理事長、中國合作經濟學會會長、中國國土經濟學研究會理事長、中國民生研究院高級顧問。2008年獲得第四屆中國發展百人獎終身成就獎。

■綜合報道

不拘一格用人才 門生眾多



■2003年7月18日，杜潤生和王岐山出席在北京舉行的農村改革座談會。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杜潤生的一個過人之處是沒有山頭卻門生眾多，他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在當時吸引和聚合了許多有抱負的年輕人。

習近平王岐山曾受教益

據人民論壇網報道，曾長期在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過的王岐山、陳錫文、杜鵬、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強、張木生、溫鐵軍等自不必說，1982年，習近平去河北省正定當縣委副書記、劉源到河南新鄉當副縣長、翁永曦到安徽鳳陽掛職，都面臨着農業、農村、農民諸多現實問題的困擾，也都得到過杜老熱情耐心的指點和幫助。

杜老90壽辰時，周其仁在發言中說：「大概幾年前，像我們這些當年有幸在杜老指導下從事過農村研究的人，好像得過一個稱號，據說原話是這樣的，無非是杜潤生的弟子徒孫。不是一個很雅的稱號。但是，我今天在這個場合講，這是一個很了不得的對我們的一個恭維。我是想不到今生今世會有哪個稱號像這個稱號，能讓我們引以自豪。」

1982年的一天，翁永曦被杜潤生叫去談話。他忽然被告知，自己是農研室的副主任了。

「杜主任，這個事可不能開玩笑。」翁很震驚，一名普通科員一夜升格為「副部級官員」，聽起來像天方夜譚。「我爹我媽1936年參加革命，到現在才是個局長，把我提到這一級，別說別人不服氣，我爹我媽都會覺得很奇怪。杜主任說中央定了，你要服從組織安排。我說到此時此刻為止，估計上下領導對我印象還不錯，但這個任命一公佈，我就立刻成為王八蛋壞小子了，污水全朝我潑過來。」

一語成讖。他的任職消息在《人民日報》頭版刊出，「最年輕的副部級幹部」立刻引發轟動。隨後，他被高層派去改革發源地鳳陽縣兼任縣委書記。翁永曦大刀闊斧，倍受關注，很快成了改革新星。

囑門生「不裝錯口袋不上錯床」

杜潤生曾說：「農村改革靠的是一個團隊，我只是這個團隊的一個符號。可喜的是，這個團隊出了不少人才，但沒有出一個腐敗分子。」他不會預想到，若干年後，他的愛徒王岐山已經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成為中共打擊貪腐的最高領導者，人們對他治下的中央紀委反腐的力度和決心也有着很大的期待。

當年一位杜潤生的門生，如今已是相當級別的領導，調到省裡面去工作前來跟老頭告別，面對杜老嚴格要求自己的叮囑時曾表示，至少會把握住兩條，第一不裝錯口袋，第二不上錯床。杜老聽完哈哈大笑說，「對，這兩條好好把握。」而在杜老看來很多人就是因為沒有做到這兩條而出問題。



■杜潤生與林毅夫。網上圖片

話你知道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指農戶以家庭為單位向集體組織承包土地等生產資料和生產任務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形式。這是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在中國農村推行的一項重要改革。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土地制度仍嚴重影響農業生產，中國國內生產力始終沒有得到恢復。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鳳陽縣鳳梨公社小崗村18名村民簽下一份不到百字的包乾保證書，將村內土地分開承包，開創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先河。當年，小崗村糧食大豐收。

1982年1月1日，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關於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台，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乾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聯產承包責任制將土地產權分為所有權和經營權。所有權仍歸集體所有，

經營權則由集體經濟組織按戶均分給農戶自主經營，集體經濟組織負責承包合同履行的監督，公共設施的統一安排、使用和調度，土地調整和分配，從而形成了一套有統有分、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糾正了長期存在的管理高度集中和經營方式過分單調的弊端，使農民在集體經濟中由單純的勞動者變成既是生產者又是經營者，從而大大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較好地發揮了勞動和土地的潛力。

■記者 海巖 整理



■杜潤生對農民特別關愛。資料圖片

畢生為農民權利鼓與呼



■杜潤生名句：「愛人民首先要愛農民。」 網上圖片

「愛人民首先要愛農民」，這是杜潤生老人的至理名言。自1950年着手土地改革工作後，對中國農民最具赤子心，對處於弱勢群體的農民特別關愛。可以說，他是一個畢生都在為農民權利鼓與呼的人。他總說：「我們欠農民太多。農民窮，中國窮，農民古代化，中國不可能現代化，誰要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忘記農民，誰就是數典忘祖！」

「農民受苦 中國就受苦」

1981年2月，在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成立會上，杜潤生講：「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中國的農民對我們真是太好了，從民主革命開始，他們就萬眾一心地支持共產黨。老解放區農民推着小板車支援前線，一直推到了勝利」，過了幾年，農

民吃飽穿暖了，他就向鄧小平建議要恢復農民協會，「農民需要一個積極的組織承擔發言人」，這樣的話，一講就是幾十年。

早在上世紀50年代，杜潤生的命運就與農村土地制度變革緊緊聯繫在了一起。

1950年初，中央決定召開全會，土地問題是議題之一。為了起草土改報告，杜潤生兩次被召到北京。在香山雙清別墅，杜潤生見到了毛澤東，這是他在解放後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杜潤生關於土改的報告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後來杜潤生又提出土改應分三個階段進行，對此，毛主席認為很有必要。

曾20年無緣農村工作

杜潤生在土改中的出色表現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杜潤生擔任了剛剛成立的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一職，鄧子恢任部長。設立中央農村工作部，目的是推行以後的農業合作化。

杜潤生再次受到毛澤東召見。但這一次，杜潤生的某些觀點和毛澤東的有了分歧。毛澤東對農村的改造思路是先改變所有制再發展生產力。杜潤生認為，土改之後，農民才從地主那裡獲得土地，成為自己的財產，自然要求獨立自主地經營發展。為此，鄧子恢和杜潤生都主張不要過於急躁，應該從農民小生產的特點出發，穩步推進農村經濟發展。對於這一點，毛澤東當初也是贊同的，但後來合作社的發展勢頭非常迅猛，「一大二公三純」的思維

模式使得當時的人們根本不顧農村的實際，造成了不應有的失誤。

不久，毛澤東不點名批評了中央農村工作部「像一個小腳女人走路」，前怕狼，後怕虎，「數不清的清規戒律」。在七屆六中全會後，中央解除了杜潤生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職務並調離農村工作部門。從此他20年與農村經濟工作無緣。而中央農村工作部幾年後也以「十年中沒做一件好事」為由被撤銷。

崗位變更仍心繫農村

離開農業崗位後，杜潤生被調到了中國科學院。工作崗位的變更並沒有淡化他對農村的關注和牽掛，他利用這段時間抓緊學習，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總結歷史經驗，對農村工作實現了從實踐到認識的理論昇華。杜潤生回憶說，雖然在中國科學院崗位上度過了20年光陰，但「心裡對農村問題總是念念不忘……向歷史實踐尋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晚年的杜潤生回顧這段歷史時說，合作化問題，我們和毛主席表面上的分歧是速度快慢的問題，而實質卻是生產力決定論和生產關係決定論的分歧。「實踐證明，集團農莊這種模式是缺乏生命力的。將它不顧實際強行推廣，是很難避免脫離實際錯誤的。」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澎湃新聞



特稿